



Simone de Beauvoir



第三卷·时势的力量·上

西蒙·波娃回忆录

K8356551
2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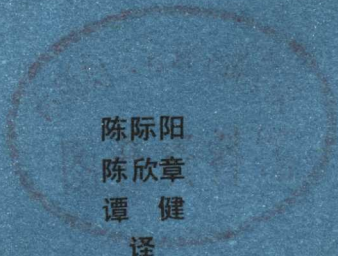
066498

S. de Beauvoir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西蒙·波娃回忆录
第三卷·上

时势的力量



陈际阳
陈欣章
谭健
译

校译：陈际阳 谭健

RBB5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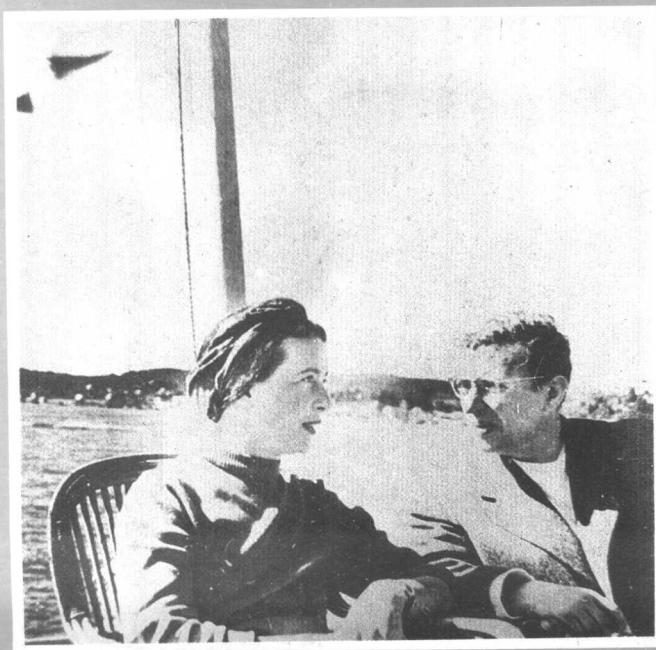
1955年，与萨特在中国访问。（左一）

1955年，陈毅元帅会见萨特与西蒙·波娃。





五十年代与萨特在巴黎剧院审排萨特剧作《涅克拉索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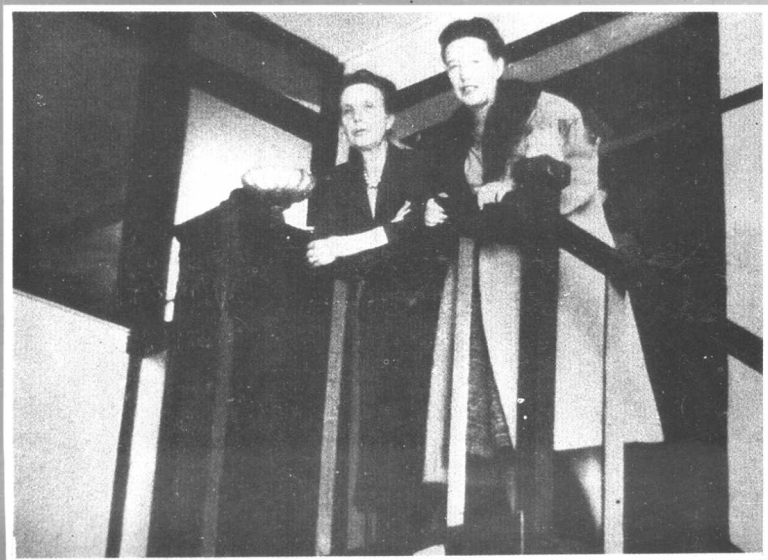


与萨特从哥德堡乘坐
“朱诺号”游船前往
德哥尔摩。



五十年代初期与萨特等人在巴黎剧院审排萨特剧作《魔鬼和上帝》(前排右二)

1954年，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当天与母亲在一起(右)。





1962年，与萨特访苏期间和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合影。

1960年，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会见萨特与西蒙·波娃。



前 言

我曾经解释过，我为什么决定继《闺中淑女》之后，继续把自传写下去的原因。在写到巴黎解放时，我气喘吁吁地搁笔了。我想知道，我所进行的工作是否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事情似乎是这样，在我重新执笔之前，我再三犹豫过。朋友、读者都敦促我继续写下去：“然后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你现在身居何处？写完它，你欠着我们许多……”然而，有一些人——也包括我自己——对此颇有微词：“为时过早。你现在还没有到写自传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说：“还是等到能公诸一切的时候再说吧。要不然自传就会变成传略，书中一些地方还会出现故作沉默，歪曲事实的现象。”当然也有人直率其词：“你缺乏眼光。”甚至有人说：“在你的小说中，你把自己表现得够充分的了。”这些说法都对，但我别无选择。不论是心境平和还是思绪纷扰，由于衰老造成的麻木使我无法把握我的主题，青春活力甫逝，暮年衰老即至。我想让我的血液奔涌在这一叙述中，我希望全力投入其中，而且在所有问题湮没之前，充分审视自己。或许这为时太早，但明天肯定又太晚了。

“有关你的故事人人皆知，”有人这样告诉我，“自一九四四年以来它就成了公共财产。”但是，这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只不过是个人生活的一个方面，既然我的目的之一就是为

了澄清某些误会，那么，和盘托出我生活中的所有事实真相，对我来讲似乎是很有必要的。迄今为止，我卷入到比较多的政治事件之中，我将会花较多的篇幅谈到它们。尽管这样，我的自传并不会过多地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如果说政治是“预见现实”的艺术的话，那么作为一个非政治家，我将要讨论的正是这一不可预见的现实：历史一天天从我身边消失的方式恰似我的主体发展一样，是一种独特的冒险。

在我将要谈到的这一时期，重点不再是自我修养，而是实现自我。虽然我一般性地接触过绘画、书籍、电影，也有过一些遭遇，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中间没有一样东西对我至关重要。当我唤起对它们的记忆时，常常是记忆的随意性主导了我的选择，但我的选择不能昭示出一种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不再赘述我在其他地方描述过的一些经历——比如我的美国和中国之行——却要详细地讨论我的巴西羁旅。当然，这样做将会使全书失去对称之美，但也只好如此了。总之，如同前几部作品一样，我不要求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就像某一个别墅花园里的一尊枯燥至极的雕像。这是收藏家的术语，欣赏者的术语，而不是创造者的术语。我从未想到说拉伯雷、蒙田、圣西蒙、卢梭创造了艺术作品。如果这一标签否认了我的自传，我是毫不在意的。不，我的自传不是一部艺术作品，而是伴随着热情、失望、骚动的我的生活；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寻求一个托词，而是希望表现它本身的我的生活。

这次，我也将尽力写得精练些。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一个传记作家总是因为拖沓冗长受到人们的批评。如果他使我感兴趣，我就一卷一卷地读下去；如果他使我腻味，读上十页就足够了。我从不为了自我欣赏而涉笔天空的颜色和水果的滋味。谈到他人的生活，我将以同样充分的笔墨提到这些所

谓的琐碎细节——如果我知道的话。这些琐碎细节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正是这些没有意义的琐碎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经历的本质真相。它们显示的正是它们自身，把它们揽入自传的唯一原因是，它们的确存在：这就够了。

尽管我的含糊其词也适用于这最后一部——要滴水不漏地叙述一切是不可能的——但是，某些批评家已经指责了我的轻率。始作俑者并非我。我宁愿仔细地检视我的过去，而不愿把这个任务遗留给他人。

一般人都认为，我的前几部自传具有一个苦心经营的优点：这是一种真诚，这种真诚既不是来自于自负，也不源于自贱。我希望我保持这一优点。三十多年来，在我与萨特交往中我一直奉行着它。我一天天观察自己，既不感到羞怯，也不觉得自负，正如我观察我周围的事物一样。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由我认识他人包括认识我自己的方式所致。我相信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责任，但不论它们多么重要，我们存在的这个范畴难以描述。能够描述的只不过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我看来，我似乎觉得我就是——一个客体，我就是一种结果，而与这种评价的功过或错误的见解无涉。在时光的流逝过程中，如果一种行为看来或多或少地值得褒扬，或是带来遗憾的话，那么不论发生哪一种情况，我更为关心的是理解，而不是评判。我宁愿揣摩自己，而不喜欢让自己飘飘然，因为我忠于事实远远超过了我对自己形象的关注：这种对事实的挚爱可以从我的历史中得到解释，但无须对此大加赞扬。简言之，因为我没有对自己作出任何判断，我也没有感到坦率地谈论我的生活和我本人有什么阻碍，至少当我将自己置放于我自己的世界之中时，情况是这样。也许当我的形象投射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例如心理分

析专家的世界中时——它将使我感到困窘或尴尬。但是，只要是我自己为自己勾画的形象，那一点也不会让我气馁。

当然，诸位读者一定要理解我所说的“客观公正”。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戴高乐主义者，对这些年的描述是迥然不同的；一个劳动者、一个农夫、一个上校、一个音乐家同样是人异言殊。但我得表明我的观点、信念、见解和兴趣，它们构成了我的真实面目的一部分，而我也正是根据它们来描绘自己的。换言之，我尽量做到客观公正，我只限于叙述过去发生的一切。

同前几部书一样，这部书也要求读者合作。我依次展现了我的发展的每一时刻，读者一定要耐心地把它读完，不要中途释卷，否则，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譬如一位评论家说萨特喜欢格维多·雷尼，理由是当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喜欢他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的确，只有恶意才会造成这种错误，但我并不想小心提防这种恶意。相反，这部书包含一切可能激发这种恶意的内容。假如这本书未能使某人感到不快，我将会觉得失望，同样，如果这本书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愉快，我也会感到失望。这就是我之所以认为本书的真实性不在书中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在它们的总体叙述之中的原因。

读者业已指出，《盛年》中有许多小错误，还有两四处严重的谬误。由于我的大意，我肯定在这本书中也犯有不少错误，但我再次声明，我决不有意歪曲事实。



第 一 章

我们解放了。在街头巷尾，孩子们正在唱着：

我们将不再见到他们了，
结束了，他们这群混蛋。

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意味着一切又开始了。莱里斯夫妇的美国朋友帕特里斯·瓦尔堡带我们乘吉普车去郊外，这是好些年来我第一次乘车外出。夜深人静之后，我又一次徘徊于温柔的秋风之中。小酒馆早已打烊，而当我们离开朗姆酒店的露天座和蒙大拿烟雾缭绕的狭小的红色的恐怖地方时，我们拥有的是人行道、条凳和街区。许多屋顶上仍有狙击兵，当我感到头顶上有人在满腔仇恨地警戒时，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一天晚上，我们听见警报声。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在巴黎上空飞行，V-1炸弹落在郊外，炸毁了一些房子。消息总是很灵通的瓦尔堡说，德国人即将完成一种新式甚至可怕的秘密武器。旧的恐惧尚未全消，新的彘觥又袭上心头。但是，欢乐立时把它冲刷殆尽。我们和朋友们厮守一处，交谈、饮酒、闲逛、嬉笑，日夜庆祝我们的解放。所有其他也沉湎于这种狂喜之中的人，不论远近，全成了我们的朋友。真乃一场兄弟式的

狂欢豪饮！笼罩法国的阴影消散了。你又可以横渡大洋了，几个身着卡其布军服、嚼着口香糖的高个士兵，向你证明这一点。他们慢悠悠地走过去，常常直打趔趄。他们哼哼唱唱，吹着口哨，跌跌撞撞地沿着人行道和地铁月台行走；夜晚，他们在小酒馆里跳舞，摇摇晃晃，大声喧笑，露出孩子般雪白的牙齿，若内这个不同情德国人而又厌恶田园诗的人，在朗姆酒店的露天座上高声叫嚷：穿着军装的平民不成体统。当初，占领者身着硬挺的黑色和绿色甲壳一类的服装，他们是另一类人！对我来说，这些无忧无虑的年轻的美人是自由的化身：这自由属于我们，并且行将扩展开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旦被推翻，弗朗哥和萨拉查一旦被驱逐，欧洲将永远驱除法西斯主义。遵循全国抵抗委员会章程，法国正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国家在经历了这场巨大的震动之后，完全能允许在不发生新的骚动的前提下，进行国家结构的重建。《战斗报》的刊头语正好表明了我们的希望：从抵抗走向革命。

这一胜利抹去了我们过去的失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它展示出的将来也是属于我们的。现在，那些掌权人物曾经——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参加过抵抗斗争。我们认识他们所有人。我们能如同密友似的列举出在报纸上或收音机里常出现的好些个重要人物。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家庭事务，我们希望参与其中。“政治不再脱离个人，”加缪在九月初的《战斗报》上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人直接向其他人所作的讲演。”我们是作家，向别人讲话是我们的工作。战前，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尝试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或者几乎是所有——都壮志未酬，我们最为赞赏的一个人就是阿兰，他已堕入了不光彩的境地。现在，该轮到我们来高举这个火炬了。

这时我已经明白，我的命运同所有其他人的命运维系在一起，人的自由、压抑、幸福和痛苦是一件与我密切相关的

事情。但是，我已经说过，我没有当哲学家的抱负。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根据他自己的处境，已经对存在的价值勾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他打算把这工作继续做下去。他将不仅通过理论思维，而且还要通过实践选择，以便确立自己的位置。因此，他发现自己以远比我激进的方式参与行动。我们总在一起讨论他的态度，有时候，我影响他。但是，正是通过他，这些问题的一切紧要 and 微妙之处，才显示在我面前。在这一方面，为了谈论我们，我不得不要谈到他。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接近共产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怀疑主义与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合拍。我们想要废弃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达不应影响我们的自由。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萨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治疗，如果我需要它治疗的话。”而在一九四一年，当他正在组织一个抵抗团体时，他拼凑了两个词作为它的名称：社会主义与自由。战争导致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首先，战争已经把他自己的历史性展示在他眼前；这种发现使他震惊地认识到，他多少已经就范于既定的秩序之中，即使是他在谴责它的时候也不例外。每一个冒险者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冒险者要塑造他的形象，把他的构想置于未来世界之中，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自少年时代以来，萨特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冒险之中，一直渴望成为一个作家和荣耀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萨特一直期望子孙后代为其自身的目的持续不断地利用本世纪的遗产。实质上，他虔诚地保持着二十岁时就已信奉的“对立的审美观”。他无情地谴责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端，但他仍旧没有推翻它的愿望。突然，一切都土崩瓦解了，未来被击得粉碎，他发现自己毫无目的地游弋在幻想的过去和阴暗的将来之间。他用他的可靠的道德来保

护自己；从自由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人把一切局面看成(假设成)一套方案，那么，这一切局面都是能够挽救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仍旧非常接近于禁欲主义。因为除了屈服之外，环境没有留给我们其他的超越我们自身的方法。萨特非常痛恨我们那些欺骗自己的小诓骗，长期以来，他从不满足于借口头抱怨来虚饰自己的忍让屈从。他认识到不能生活在绝对之中，而应该着眼于短暂和瞬间，他不得不放弃存在，决意付诸行动。凭借他从前的发展，这种转变对他来讲易如反掌。作为一个思想家、作家，他最为关心的就是抓住意义。但是，他在一九四〇年读了海德格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后确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用实践来替代思考，意义才会呈现在世界上。在虚张声势的战争期间，他对我说——他在一封给布里斯·帕兰的信中也是这样表述的——和平一旦恢复，他将步入政界。

他的囚徒经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使他懂得了孤独的含义；他远没有被迫害的感觉，而只有一种参与了集体生活而获得的极大快乐。他厌恶特权；他的自信促使他凭借自己的才智去上下求索。起初，他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但他从零开始，在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他结交朋友，向人灌输他的观点，组织活动，动员整个集中营在圣诞节排演了一个由他写成的反德国人的戏剧《巴里奥纳》，并为之喝彩。监狱里的困难、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缓和了他的反人道主义的矛盾。实际上，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赞颂一个人化的自然；但是，如果人仍将被创造，那么不会再有什么任务更能激起他的热情了。自此之后，他不再把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他将通过塑造客体，通过根据自己的志向构筑未来，而不是通过使主体顺

从于给定的环境，来实现自己的自由。这个未来就是社会主义，它代表了他所喜爱的民主原则。迄今为止，只是由于害怕因此失去他的个性，他才对社会主义顾虑重重；但是现在，他不仅看见了实现人道的唯一机会，也看见了他自己实现人道的必需条件。

“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失败给了萨特一个现实的教训，不久之后他便开始做一项严肃的工作，在全国阵线里面与共产党合作。

一九四一年我就已经说过，共产党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得冷淡起来，他们还传言说，萨特是因为充当了德国人的间谍而获释的。一九四三年他们想要统一行动。事实上，有一份据说是出于共产党员之手，并在法国南部印刷的小册子，其中萨特的名字出现在黑名单上，夹在夏多布里昂和蒙泰朗两个名字中间；他把这给克劳德·摩根看，克劳德·摩根大声叫起来：“那多丢脸！”后来，他们再也没提过这件事。萨特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完全是友好的。既然德国人走了，他就满心打算把这种关系保持下去。右倾的唯心主义者用精神分析的行话解释他和共产党的联盟。他们把这归之于自卑情结、被压抑的攻击性、幼稚病和对宗教的留恋。多么荒唐！群众在作共产党的后盾；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而且，萨特现在懂得，他与无产阶级的联系需要对他的整个存在从根本上予以重新考虑。过去，他总是把无产阶级想象成一般的阶级。但是，只要他相信他能从文学创造中得到绝对，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就保留在次等的位置。在发现他的历史性的同时，他还发现了他的依赖性；不再有永恒存在，不再有绝对存在。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渴望的“一般性”现在只能从使之具体化的饮食男女中去获得。他一直在思考他以后所表述的：与自己彻底决裂的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剑